

血性豪情 铿锵战歌

——评电影《战狼》 □吕益都

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个性鲜明的特种兵主人公,真枪实弹的高科技作战,新颖真实的作战技巧,紧凑明快的叙事节奏,如临实战的视觉冲击——影片《战狼》的横空出世满足了观众期待已久的对中国当代战争影片的审美渴求。

站在中国战争影片的历史坐标点上审视,《战狼》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当代战争影片,特别是描写新军事革命背景下中国军人新使命新任务的战争影片,数量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像《冲天飞豹》《冲出亚马逊》《开十出击》《目标战》,而真正突破“文戏”、“训练”、“演习”,以表现对敌实战为主,并展现出高科技、立体化、联合作战的影片,只有《战狼》。

《战狼》的当代战争气质使其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感,被赋予了军事时尚色彩的魅力,并具备了特殊的贴近现实的意义。

一、故事叙事与军事特色的紧密融合 影片将环环相扣又生动真实的作战方案、战术技巧与军事技能组成叙事的内核,不断释放叙事推动力,并构成情节的吸引力。影片开场,配合行动小组的抓捕行动,狙击手冷锋沉默地蛰伏、精准地计算,射出那枚扭转局势、凝聚愤怒与自信的子弹。惊心动魄、动静交替的专业军事“语态”的影像呈现,从影片开场即构建了引人入胜的观赏效果。

在与恐怖分子展开殊死较量的情节桥段,布控炸点、排除地雷、躲避狙击、单兵搏击,一系列的军事技巧与作战战术直接构成情节的焦点。小分队丛林巷战的单兵实战技能获得全面展现;高科技先进作战装备与立体化联合作战显现冰山一角。在这其中,千钧一发、出奇制胜、短兵相接、勇者无惧,构成了叙事的紧张悬念与气势能量,而卫星定位通讯、高科技作战指挥中心,则展现着当代军事战争的最新“语汇”。一组组与军事特点紧密衔接的情节与镜头,既带来叙事的特点、视觉的冲击,调动着观众情绪的兴奋点,又以其新鲜的影像组合,为观众铭刻下中国当代战争影片全新的观影体验。

显而易见,“战斗”始终是影片的关键词。不仅有与境外恐怖分子真枪实弹的战斗,有红蓝军的演习对抗战斗,还有“战狼”队员与真正狼群的战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战斗为影片带来精彩迭现的军事场面,使影片保持着紧凑、流畅、明快的剪辑节奏,还显示着主人公团结协作、并肩作战的狼性与虎虎生风、威武不屈的性格霸气。在这其中,睿智判断、敏捷身手,骁勇出击、无惧牺牲,战斗性与战斗精神被层层渲染出来。与此同时,影片一两处细节“闲笔”,以战斗之外的铁汉柔情调节着影片的节奏与紧张氛围,携带出生动的情绪感染力。像冷锋的战友把女儿的照片缝在帽子里,表达了一个报效国家不能经常看到女儿的父亲的心细腻情感;冷锋与李晓云之间充满情趣的对话与情感表白,表现了粗犷军人阳刚之中的温情。

二、主人公形象塑造的“非比寻常” 实际上,除了叙事桥段上军事色彩赋予影片的魅力,影片对主人公冷锋匠心独具的艺术塑造,也构成了影片突出的亮点。在冷锋的身上,观众感受到了

中国新一代革命军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品质与特点。冷锋有着鲜明的个性。作为特种兵,他充满智慧与胆识,本领过人、艺高胆大,充分的自信中流露出桀骜不驯的气质,但这些又以军人的忠诚爱国为底色,加之尚武情怀与血性尊严,他的种种判断与行动往往凝结着职业军人生命的分量,展现出正能量的积聚与迸发。当他精准计算,以令人瞩目的狙击技术将愤怒的子弹射向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时;当他被直升机的绳索吊起运往战狼中队,以潇洒的身姿凌空高蹈、云中漫步时;当他以高超的专业技能胆大胆心细排除地雷时;当他动如脱兔在敌方狙击手子弹上膛到击发的短暂瞬间奔跑跳跃、闪躲腾挪时;当他搏击外国雇佣兵、活捉大毒枭,在国境线上一夫当关、一将退敌时;当他以自己的豪情与能力赢得孤傲上峰龙晓云的爱情时——一个具有偶像色彩、侠客风度、理想化气质的当代英雄形象被树立起来。冷锋无疑是独特的“这一个”,是中国当代战争影片中具有“战神”意味的崭新形象塑造。

并且,较为难得的是,在密集的军事桥段叙事中,影片见缝插针地描绘了冷锋的“心灵创伤情境”,被敌方狙击手击中的受伤战友为了不拖累大家,要求自己人“给来个痛快的”。同样的情景也曾出现在冷锋的父亲面前。抉择的结果触及战争伦理与人性道德的尖锐问题,冷锋的父亲因此背负上纪律的责罚与心灵的枷锁,并在冷锋心头留下阴影。而面对同一情境的再次上演,冷锋没有让“昨日重现”,血性的迸发,使他突破了“父子同境”的魔咒,一个英雄男儿在战火洗礼与内心创伤的修复中,真正完成了他的成长。影片虽然涉及主人公心灵的笔墨并不多,但可见试图挖掘主人公内心情怀、丰满人物形象的努力。

三、强烈的爱国情怀、藐视强敌的英雄气概 不言而喻,影片所散发的浓烈爱国情怀是支撑影片叙事、人物塑造的根本,也是为影片带来强大正能量,令人热血沸腾的源泉。《战狼》借助反恐主题,鲜明地彰显中国军人为正义而战的决心与气势,体现了新一代中国军人的血性豪情。无论是临战前战狼勇士们换上中国军人的臂章;战后那枚凝结着荣光、致敬与成长的军功章,还是国境线上敌人怯弱的眼神,纷纷退却、不敢逾越的行为——爱国的符号在影片中被理直气壮地凸显,国威与军威的凛然不可侵犯,被“钢性”传递。影片以窥斑见豹、画龙点睛之笔显现了“威慑三要素”,即“有实力”、“有使用这种实力的意志”和“让敌人知道以上两点”。结合当下现实与国际背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是一种铮铮誓言,一种坚定立场,更是在宣示主权、宣示尊严,是对胆敢覬觞者的警告。正是在这一点上,《战狼》生逢其时,并具有了特定的现实意义。

当然,从艺术品质而言,《战狼》并非完美。其叙事技巧与情怀表达应有更为精致与巧妙的开掘空间。但无疑,《战狼》喻示着中国战争影片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并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践行强军目标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期待有更多超越《战狼》的中国当代战争影片的出现。

发现李素芝的意义

□陆文虎

殷实创作的《天行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真实地记述了一位新时代雷锋的行迹。

雷锋是战士的完美榜样。他生活在一个已经远去的朴素、激情、集体主义、物质匮乏而社会风气良好的年代。那时,人们的革命理想高涨,奉献精神普遍,官员的贪污腐化只是个别现象,普通人的自私自利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人们还不认识个人的价值,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随时都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真诚地想当革命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我为人人”是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事原则,“人人为我”则不为人们所看重。雷锋是一个单纯、善良,有宗教精神,始终在自我完善的典型,雷锋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浓缩和升华,雷锋境界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的理想境界,是一种即使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境界。后来,雷锋被广泛宣传、大力神化,最后达到被人质疑的高度。与此相伴随,大量雷锋式英模不断出现。其实,历史已经发展,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人的主体性大大提高,个体的价值受到尊重,社会价值观已经呈多元化,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化和改革开放后的普遍商业化,今天的中国人已与往日大不相同。人们认识到,虽然生活中还有伟大的人、高尚的人,也不乏善良的人、美好的人,但是,不可能有绝对奉献、绝对利他、绝对纯粹的人。即使是模范和典型,也不应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不需要物质生活、没有任何缺点弱点的抽象的人。

然而我们发现:李素芝异乎是。李素芝既有时代精神的高度,又没有被污浊的社会空气所污染。1976年主动要求进藏时,他继承了雷锋精神。在西藏38年的实践中,他把雷锋精神已经发扬到一个雷锋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新的高度。殷实说,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李素芝,能够找到李素芝的“真身”和“灵魂”。作为一个汉族人,他认为“藏族牧民纯净眼光,渴望的眼神,目送的目光,可以洗净自己的灵魂”。因此,他真诚地尊重藏族同胞、爱护藏族同胞,他尊重他们的生命,尊重藏民族的文化、尊重西藏的人权。他对待他们犹如对待自己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作为一名医生,他“着眼于这块土地上民众的幸福安康、社会的真实改造”,不仅全心全意地为藏胞服务,而且是科学地、神奇地解除他们的病痛和生活上的困难。藏族牧民给他献哈达,要求他摸顶,这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信任和爱戴,这时他就是藏胞心中的活佛。作为一名专业技术军人,他做手术1万多例,写论文200多篇;他用自己精益求精的本职工作、创新的理念、精湛的技术、他创造的新学科、新技术、新医药,治愈无数,救活无数;他以实际行动打动了僧侣、藏胞的心,为藏地的安宁稳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作为一位院

长,他以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为西藏军区总医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非比寻常的贡献。作为一位副司令,他不仅考虑如何强化驻藏部队战斗力、增强官兵体质的问题,还有效地调适着驻地藏胞的情绪,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向心力。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他历经着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的现实体验:事业的顺逆起伏,舆论的褒贬不一,心情的喜怒哀乐,身体的病痛伤疼,家庭的分居聚合,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他既是一个有伟大事业、有高尚灵魂、有重大成果、有人格魅力的人,又是一个与常人无异、沉浸于人间烟火、经历着日常琐事的普通人。正因为这些,李素芝才可爱、可信、值得尊敬。李素芝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现实中一种稀缺的人格类型。

《天行健》是一部通过写个人而写出群体的报告文学。不是只突出个人,而是突出群体中的突出者,写突出个人带动起来的突出群体。

我惊喜地发现,殷实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学者。《天行健》是一部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来意义的跨学科文本。作为文学作品,我不仅从中读到了诗人固有的热烈激情,还读到了哲学家从案头上形成的冷静思考,读到了历史学家通过稽古钩沉得来的远见卓识,读到了文化人类学者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也读到了科普作家深入浅出的医学普及。作者的激情和思考,引领读者走向真实的西藏,使我们在了解李素芝的同时,还了解了淳朴、真实的藏族文化,看到了藏地的风物,领略了西藏之美,接触了藏区文化,了解了西藏问题。殷实指引我们看到的,不是被误读的西藏,既不是某些人眼中的香格里拉,也不是西方媒体的恶意偏见,而是一个真实的西藏。所谓“西藏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和绝对的问题。新中国废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大幅度飞跃。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方式也极大地现代化了。当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7岁。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能看出西藏的发展、变化。那些植根于西方经验的“东方主义”言说,与现实的西藏是完全格格不入的;那些对西藏历史一无所知,对今日西藏不屑一顾,对现代藏族思想文化发展置之不理,一味鼓吹“西藏独立”的人,其实是极为可笑的。殷实用有节制的史料细节展示了西藏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现实,告诉我们西藏为什么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回顾了旧时农奴制度下西藏百姓的痛苦生活,告诉我们今日西藏的客观样貌,告诉我们那里究竟需要什么,那里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于是,我们才读懂了李素芝的意义。

中国战争题材文学的“碑”

——评黄国荣长篇小说《碑》 □汪守德

人入微地描写与刻画了官兵战前的真实心理和情感活动,在豪壮中,不回避紧张、慌乱、出汗、怯懦。小说把每个即将参战的军人,作为可以理解 and 想象的正常人放在战争这面镜子前来观察、鉴照、呈现他们可能的内心与灵魂的影像,让我们看到战争状态下一个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士兵形象。这是我读到的描写官兵战前的反应最为细微、最为逼真、最无矫饰、也最为可信的中国战争文学作品。

正是通过对这种临战氛围的强化描写,小说凸显出主人公一连之长邱梦山鲜明的个性形象和英雄品质。他一方面全身心地为应付突如其来被作战俘交换回国后的种种遭遇与处境。其间穿插邱梦山与爱人岳天岚婚姻生活与情感纠葛的极为扣人心弦的描写。《碑》涵盖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生活形态,两种形态下人的遭遇与命运、生存与生活、思维与情感截然不同,作品对其进行的揭示与透视,带来的崭新思考与表现,使中国作家关于战争中人的命运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更使中国战争文学在解析和揭示战争问题和军人形象时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与胆识,我们从读出尖锐的疼痛和灼人的关爱。它以强有力的文学力量,对某些向以为是天经地义、冷酷无情的观念进行鞭挞,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思。这就是《碑》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再现中国式的战壕真实。《碑》的切入点看起来很平常。连长邱梦山与新婚妻子岳天岚如饥渴地享受着和平阳光之下欢度蜜月的无限快乐,肉体的狂欢迅速消弭了两位仍很陌生的新人之间的心里与情感距离。一封催归电报打断了他们甜蜜的梦。告别也许是人生生活最为常见的镜头,小说别出心裁地写到两位沉浸幸福之中的忘情人在列车上旁若无人地拥别时,岳天岚未能及时走下悄然开动的列车,邱梦山索性将错就错地把妻子带回了部队。他们下车时,竟有200多个像邱梦山一样奉召火速归队的军人,事情有些不同寻常,但茫然四顾的他们并未意识到战争真的突然来临,这种不露声色的叙事悄然地嵌入了浓郁战事氛围的暗示。小说的叙述是写实的、诗意的、浪漫的,如同我们在许多电影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此类经典镜头一样,给人以深情感伤的美丽印象。

小说就是在此情况下,让邱梦山和他的连队猝不及防地进入战争。作品让我们感到,战场的硝烟与烈火都已渐渐冷却和远去,而当战争真的来临,官兵们必须面对生死时,一切都将变得严肃而凝重。《碑》同以往许多作品不同的是,不仅仅着力表现官兵们在临战状态下怎样同仇敌忾、摩拳擦掌,豪情勃发地要上战场杀敌;而是细致

俘。战俘这一字眼所带有的社会含义和巨大屈辱感攫住了他的心,即使在意识迷糊中,他也不得不迅速思考“战俘”将给他带来的种种可能的不测,包括名誉、家庭、妻儿的将来,巨大的挫折感和精神压力使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结束生命。对此,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此种情境下邱梦山激烈的内心活动,英雄末路的悲凉心境,让人体味的意涵可谓良多。因突围时穿错军装,他被阴差阳错地成为“石井生”时,这种身份的错置更在他内心掀起波澜,他在对这种身份的犹豫、否定与确认中度过极为复杂的心理与精神历程。这是小说所设置的最为令人痛彻心扉的扣子,此种转折表明我们的民族个体在此问题上承受着怎样的精神重荷,表明不畏惧生死的邱梦山在面对这两难时又出于怎样的无奈,让人忍不住要为这样的英雄潸然落泪。这虽反映出邱梦山的性格之短,并为之背上了更为沉重的包袱,却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英雄的存在。身为战俘的邱梦山,面对敌人的残暴与淫威,与同为战俘的战友们一起机智勇敢地同敌展开殊死斗争,在极度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突破千难万险快要达成返回祖国的目的时却功败垂成。小说不只描写邱梦山们的誓死抗争,也揭露了敌人对我被俘人员令人发指的虐待与折磨,5年的非人生活,他没丢英雄本色。作者的文笔完全是写实式的,体现出冷峻非凡、直刺心底的力量。

《碑》以新的文学思维,在战争题材领域开辟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新道路。作品正视战争环境下军人真实的行为、心理和情感,以严格写实的手法,描写我军官兵临战时的英勇无畏与奋不顾身以及少数人的怯懦怕战,描写战争状态下军人经历生死的具体过程,描写战争中所实际具有的残酷而血腥的现实与场景,有一种把读者直接带入现场,体验和经受着战争血肉横飞的心理冲击,获取震撼人心的强烈美感与写作效果,体现出了显而易见之突破意义。

对英雄命运的深切透视。邱梦山因为穿错军装作为石井生交换回国,追悔与庆幸经常交替咬噬着他的内心,使其在两难确认中备受困扰和煎熬,经受着人生的和心灵的挣扎,直至其悲剧性命运的最终完成。双方交换战俘的场面被作者写得意味深长。对方被俘人员的着装与形态,表明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我方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这同敌方以残忍的手段折磨和摧残我方被俘人员的行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尽管我方被俘人员激动于回到了久已思念与盼望的祖国,纷纷扔掉对方配发的衣裳,洒下滚烫而苦涩的泪水,却抹不掉被俘这一耻辱的事实和标记。我们用人道主义的态度优待敌方的战俘,对自己的战士被俘却与投降或叛变相提并论。因此,邱梦山



感受到的并不全是回家的喜悦,更有巨大的灵魂拷问和精神战栗,无论以谁之名生存,他都将顶着战俘之名具体地度过屈辱的每一天。对此,小说以相当多的篇幅和极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邱梦山此时内心的困境与挣扎,引领我们毅然进入这种理应正视、却鲜被关切的生活与情感天地。回到老部队,邱梦山由战前的连长,5年后勉强被“提升”为副连级。他既要面对原本的邱梦山所要面对的全部人际关系及绕不过去的亲情,又要以假“石井生”的身份来面对作为真“石井生”所必须面对的所有关系。尽管负伤使他毁了容,但他不能不让最为亲近的妻子岳天岚以及生他养他的父母产生恍惚和疑惑。他在进行残酷苦涩的“表演”时,承受着无法言说的心灵煎熬,其处境无疑是十分难耐而又悲怆的。邱梦山转业到社会后的遭遇,是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更是小说所切入和传达的核心意蕴。安排工作举步维艰,在民政厅、统战部转关系时遭遇的冷漠与鄙薄,已经到了邱梦山所能承受的心理极限,读者也会随之心痛。邱梦山在印刷厂的遭遇,更是对人物所处逆境的进一步深化。厂长李运启的无端猜忌与刁难,厂办公室主任良的阴奸损坏,邱梦山苦心创业即使有副局长的支持,但因改革触及了一些人的私利,邪恶力量便借助社会的偏见把邱梦山逼上了人生的绝路。小说从人性和理性的高度,为英雄正名,不能让真正的英雄因为我们的偏见,在现实中屡遭凄苦的命运而悲伤落泪。

颇为可贵的是,小说写到陷入窘境 的邱梦山,依然大刀阔斧地进行企业改革;对战友李婧妮鼎力相助;勇敢救下遭劫持的女子;以极大的热情襄助陷入困境的战友;奋不顾身进入满含毒气的下水道救人直至壮烈牺牲。小说的寓意在于表明,即使生活现实向邱梦山展示的是悲凉落魄的境遇,他仍不改其英雄的本色。小说的最后

一笔,令人读来有悲怆难抑之感,然而却完成了英雄式的命运和结局,也使小说更具完美的结构形式和悲剧性的文学力量。

不容忽略的是,作品对其妻岳天岚迭宕境遇和情感脉络的描写,更丰富、更深刻地揭示了邱梦山的命运。小说对岳天岚内心复杂而真实情感的深入挖掘与表现,不止使这个人物极具生活的质感和独特的个性,也从这一重要侧面增添了邱梦山形象的悲剧性色彩和作品的文学意味。曾经发生的那场局部战争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强烈的感觉,但对岳天岚则意味着构成了她灵魂的全部,彻底改写了她的命运。邱梦山“战死”,小说独具匠心地以岳天岚在屋子里贴满邱梦山的照片这样的细节来反映她的情感表达。更为残酷的是,她只能独自面对这无解的人生危机,承受着两难选择的心灵重负。最终她用电视寻亲这种问遍天下的方式,虽然换来的是邱梦山的再度死去,但岳天岚的这种情感归属,则具有石破天惊的理想化意味,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安慰。

《碑》的多重意义和价值。首先是对战争真实性的呈现与描写。是否敢于正视战争的残酷,恰恰是一个民族心智与精神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碑》以高度写实的笔墨,对战争实有的生活质感进行了精细而有力的描绘,既真实反映出战争残酷噬血的本质,饱含着对于战争中每个生命个体的深切关怀,又张扬着我军官兵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惨烈无比中洋溢出脚踏大地的英雄主义,更加令人敬仰和震撼人心。

小说的力量来自对人性的揭示,牺牲的石井生的碑立起复被推倒,活着的邱梦山却有一块碑立在烈士陵园。故乡的山水间也有他一丘坟茔,他还要以石井生身份虔诚地去祭扫。他只能以战友之名看望和孝敬日益衰老的父母;眼睁睁看着爱妻另嫁他人,以“叔叔”的名义关爱亲生儿子。作品从人性的最痛处落笔,写出一切都以无情而残酷的错位方式面对着邱梦山,包含着多么荒诞扭曲的人生意味。

小说对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的深度把握,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极重的分量、极强的冲击力和重要的文学价值。邱梦山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在逆境中决不妥协与放弃的意志,对丑恶现象敢于奋力抗争的精神,以及深藏在内心对妻儿父母及战友朴素而真挚的爱,都体现了军人的根本特质和这个人物的性格基调。邱梦山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人物,是作者从历史的幽暗处涉险托起的文学形象,理应成为中国战争文学人物画廊中与众不同、值得重视的“这一个”。小说反思性、批判性特征更显而易见,作品担当了对过去看似正确的某些观念提出尖锐质疑的责任。作者把仅仅这个沉重的字眼和话题摆在面前,这不仅仅是一名军事题材作家的文学情怀,更是可贵的家国情怀和人情关怀。他要告诫我们的是,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战俘”之名,不分青红皂白地鄙薄曾经为国而战的军人。我以为这是站在世纪制高点上进行的思索与观照,让我们感觉到的是警醒与穿透的力量。